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文库

模糊修辞的语用分析

——政治文本的语例研究

Pragmatic Analysis of Rhetorical Vagueness

—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olitical Texts

庞建荣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文库

模糊修辞的语用分析

——政治文本的语例研究

Pragmatic Analysis of Rhetorical Vaguenes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olitical Texts

庞建荣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模糊修辞的语用分析: 政治文本的语例研究 = Pragmatic Analysis of Rhetorical Vaguenes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olitical Texts / 庞建荣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5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文库)

ISBN 978-7-5600-6615-8

I. 模… II. 庞… III. 修辞—语用学—研究 IV. 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3441 号

出 版 人: 李朋义

责任编辑: 张 易

封面设计: 袁 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5 1/16

印 张: 14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6615-8

定 价: 21.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高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旗帜， 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文库”总序

最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强调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党中央号召，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努力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更大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和高层次建设人才成长的摇篮，在党中央大力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新形式下，将发挥更大的作用。67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广大师生发扬“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的优良传统，勤俭办学，艰苦奋斗，积极探索，求真务实，使学校成为我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教育研究的重要基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江泽民总书记语，参见《光明日报》2002年4月29日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一定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不断拿出无愧于时代的理论、高水平文化成果，为使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有一个新的更大发展继续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外国文化（含文学、语言、翻译理论、历史、哲学等）研究，属于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外国语学院除了承

担全校的外语教学外,还设有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日语语言文学专业、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德语语言文学专业和法语语言文学专业,各专业分别有一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较高学历层次、职称和年龄结构合理、发展后劲很强的学术梯队;外国语学院学者、教授们具有直接接触最新外文资料和信息优势,应该在向今人学习,向古人学习,向国人学习,向外国人学习的基础上,在建设理论创新体系,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等方面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建立“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文库”,旨在了解并进入世界学术研究最前沿、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外国语学院将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分期分批、有计划地撰写出版研究外国文学、外国文学批评理论、外国文化、外国文化理论、中外语互译理论、外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外国历史、外国哲学、外国社会学等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学术专著。

这些专著虽然角度各异、文笔不同,但相信爱好外国语言、文学、历史、人文地理等领域知识的朋友会从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点。特别是书中一些独到的见解和写作手法,富有启发,会给读者带来一些思考和启示。弗朗西斯·培根曾说:“读书可以怡情,可以添彩,可以长才。”如果“文库”能在这几个方面或其中一个方面对读者有所裨益,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最后,希望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学者、教授们与全校各学科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一道,肩负起历史重任,高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旗帜,勤奋工作,刻苦钻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不断做出自己的贡献,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谱写新的篇章。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5年3月31日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文库”

创 建 词

沐浴着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春风,“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文库”终于在 2005 年春暖花开时节启动。春天是孕育生命的季节,我们为文库的诞生而欣慰,并将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促成文库的发展壮大。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所谓的西方中心论日益受到挑战,从而显露出多元文化繁荣的曙光。与此同时,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一个认识渐渐成为共识,那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在与异文化不断的比勘中,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近几年来,跨文化研究正在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并被学者们应用到各个领域的研究。在“和而不同”的原则下,不同文化间得以平等对话、交流。各民族文化通过比较、倾听他人,以他人的视角看自己,而后努力发掘并不断繁荣自己的文化,从而在与异质文化的多元共存中获得一席之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筹建的文库旨在了解并进入世界学术研究前沿、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文库将首批推出下列 6 部专著:陈世丹教授的《虚构亦真实——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研究》和《冯内古特小说的形式创新与意义深度》、刁克利副教授的《西方作家理论研究》、孙宏教授的《论中美两国文学中的地域主题研究》、庞建荣副教授的《模糊修辞的语用分析——政治文本的语例研究》和龙艳副教授的《乔治·爱略特作品中女性的反抗与沉默》。

既然名为文库,必然是个前赴后继以实现其规模的学术行为。今后我们将陆续推出包括英语、德语、日语、法语、俄语等各语种的系列学术专著,借鉴和吸收各个民族的优秀而前沿的文化成果。我们拟在最近几年陆续推出以下专著:

《俄语语用学》
《日本动漫文化对中国及亚洲地区的影响》
《德英语言对比研究》
《20 世纪美国文学与圣经传统的同构关系——美国小说的基督教视角》
《浮出历史的文本——当代英国女性文学研究》
《类型——逻辑语法》
《译事三论——英汉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
《英语学术语言中的修辞方法》
《多维角度透视中国目前大学英语教学模式》
《中美组织文化的异同及其成因》
《英语语言学与英语语言交际》
《俄罗斯报刊政论语体研究》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的俄罗斯女性文学》
《第二语言习得的认知实验研究》
《德国文化精粹》
《美国文化研究》
《日本作家与日本侵华战争》

张卫平(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

2005 年 4 月 14 日

Acknowledgements

Thanks to the numerous sources of valuable help, I managed to complete this book in the present form.

I began to take vague language as a research topic four years ago, and during this time many people have become involved with my interests and helped me in different ways. I owe all of them a great debt of gratitude.

First and foremost,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felt thanks to my supervisor, Professor Zhou Liuxi, a truly great guide in my past years' academic pursuit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ithout his brilliant inspiration, patient guidance and insightful comments, the completion of this book would be totally impossible.

My deep gratitude also goes to Professor Wu Tieping for his generous help and great concern. His pioneering work on vague language enlightened me greatly on my research work. His profound knowledge and academic rigor exerts great influence on me not only professionally but also spiritually. I am especially obliged to him for his preface to this book.

I am also grateful to my colleagues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Renmin University for their care and consideration. My sincere thanks are due to Professor Zhang Weiping for his great efforts in making this book possible. Special thanks should be extended particularly to Professor Shen Xinsun, Professor Li Shoujing and Professor Zhang Yongxian who have been encouraging me and supporting my academic career over the years.

Many friends have shared their ideas with me and provided me with valuable help in numerous ways. I am very grateful to Dr. Qin Xiugui for reading some of my early chapters and proof-reading my abstract by email, and I'm specially obliged to Dr. Li Jinglian for being generous with his time reading my whole draft and offering valuable suggestions. I also want to thank Dr. Li Meixia and Dr. Qi Zhenhai for their kind encouragement and valuable

friendship. I cherish the time working together with Dr. Zuo Xiulan, Dr. Wang Yina and Dr. Wang Qing who made my past years' academic study more meaningful. 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Dr. Si Lianhe, Dr. Ma Qiuwu, Dr. He Honghua, Dr. Chen Huijun, Dr. Wu Jiangsheng, Dr. Pan Zhangxian, Dr. Lü Ping, Dr. Ye Qichang, Dr. Tao Wenhao, Dr. Tian Xuejun, Dr. Wang Bin, Dr. Shi Gengshan, and Dr. Chen Xianglan for their encouragement and friendship.

Last but not the least, love and gratitude to my husband, Liu Ruiming, for his financial and emotional support for my academic career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His time and effort in accompanying me to explore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Library and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y is of considerable help to the completion of this book.

伍铁平序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庞建荣博士邀我为她即将出版的专著《模糊修辞的语用分析》作序,我欣然应允。

庞建荣同志近年来专注于模糊语言的研究,她曾就模糊语言方面的问题多次同我进行商讨。她在大量阅读模糊语言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有关模糊语言的学术见解,并发表了多篇有关模糊语言的研究论文。看到她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专著出版,我作为模糊语言学的一名研究者,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些国外模糊语言学研究的新进展,以及补充一些我未及写进拙著《模糊语言学》⁽¹⁾的一些内容,以利于对模糊理论感兴趣的读者。

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属性之一,对语言模糊性的探讨一直是哲学家、语言学家的一个关注热点。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已注意到了“模糊”这一现象。古希腊哲学家 Eubulides 提出了著名的“连锁推理悖论”(sorites paradox)或称作“麦堆悖论”,即“如果 n 粒麦子构不成一堆(heap),那么 $n + 1$ 粒麦子也构不成麦堆。”这里的“堆”就是一个模糊概念。究竟多少粒麦子才能构成“堆”,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况且,地板上的“一堆”(麦子)和场上“一堆”(麦子)其数量显然大不一样。“成堆”与“不成堆”之间不存在只有一粒麦子之差的截然分明的界线。这个悖论说明用精确概念无法描述“堆”这样的模糊概念。⁽²⁾到了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哲学家开始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探讨语言的模糊性。在他们看来,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研究语言本身,特别是研究语义。因此语言的模糊性(特别是语义的模糊性)成了许多哲学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1923 年 B. Russell 在他发表于《澳大拉西亚心理学和哲学杂志》(*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第 1 卷上的论文《论模糊性》(“Vagueness”)⁽³⁾中曾以红色为例,说明颜色构成一个连续统(continuum)。红、桃红、橘黄等颜色之间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光谱上的有些颜色如凭肉眼判断,有些人可能认为是红色,另一些人却可能认为是橙色;介乎这两个区域之间有一个区域让我们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其为红色。

1965年美国控制论专家 L. A. Zadeh 在《信息和控制》(*Information and Control*)杂志第3期上发表论文《模糊集》(“Fuzzy Sets”),这标志着模糊理论的诞生。与此同时,跟模糊理论相关的一系列学科,如模糊数学、模糊逻辑学、模糊语言学等也应运而生。

我在拙著《模糊语言学》序第 v 页上引用了赵元任 1959 年在《汉语的歧义问题》(“Ambiguity in Chinese”)⁽⁴⁾中谈到歧义(ambiguity)、模糊性(vagueness)和概括性(generality)之间的区别。最近读到赵元任 1968 年著《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⁵⁾。这本书迄今没有中译本。《赵元任全集》第1卷⁽⁶⁾所刊的赵元任为《语言问题》⁽⁷⁾写的“再版序”中提到,他的上引《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内容跟《语言问题》不同。因此我有必要将《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中的第12章“各种符号系统”(“Symbolic Systems”)中的第70节第4部分“歧义、模糊性和概括性”(“ambiguity, vagueness, and generality”)中的有关部分(我在上引《模糊语言学》中介绍赵元任关于模糊问题的叙述时尚未见到)译出,以供后人撰写“模糊语言学研究史”等时参考。赵元任在 1959 和 1968 年两次谈到这个问题,可见他那时已站在当时科学研究的前沿,并且似乎预见到这个问题的前景远大和人们可能产生的将歧义、模糊性和概括性混为一谈的错误。这说明赵元任不愧为一位语言学大师。

赵元任说:“谈到一对多的情况时,十分重要的是要区别歧义的(ambiguous)、模糊的(vague)和概括的(general)符号,一如 M. Black 在其《语言与哲学》(*Language and Philosophy*)⁽⁸⁾第11章所精辟分析地那样。例如,在‘ $d > t$ ’中,‘ $>$ ’这个符号是歧义的,因为它既可以表示‘ d 大于 t ’,也可以表示‘ d 变成 t ’。通常歧义可以通过确定上下文或其他限制性的条件加以排除……(省略的话语已见于上引拙著《模糊语言学》序第 v 页。)短语‘多云的’(partly cloudy)或相当于‘多云的’的天气图是模糊的,但没有歧义。‘多云’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但是在‘晴(天)’(clear),‘多云’(partly cloudy)或‘阴(天)’(overcast)之间存在着云彩多寡的某种边缘状况,这时究竟采用上述哪个词语来说明这种状况是很难确定的。……当我们说一个符号是概括的时候,我们指的是这个符号适合于一个类别中的任何一个成员。例如在不等式‘ $x + t > x$ ’中,‘ x ’是代表任何实数的概括性符号,‘ t ’是代表任何正数的概括性符号。”

在这段话中,赵元任利用他的数学知识对歧义、模糊和概括之间的区

别作了精彩的分析。当然,如果换一个上下文,“>”也可以说是多义的(polysemous),即它既可以表示“大于”的意义,也可以表示“变为”的意义。

模糊语言学催生了认知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是近几十年来国际语言学界新兴的一个语言学学派和一种新的理论。⁽⁹⁾范畴和范畴化研究是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课题。从认知角度研究模糊语言的学者中有对传统“类别观点”(categorical view)提出质疑的 W. Labov,有提出“典型论”(prototype theory)的 E. Rosch,还有研究人类思维和认知方式的 G. Lakoff 等。古典哲学的“范畴”理论框架发源于柏拉图的 eidos(种、类、物种)。这种哲学将一个范畴看作是由地位完全平等的成员组成的。然而,E. Rosch 在她 1975 年发表的论文《语义范畴的认知表征》(“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Semantic Categories”)⁽¹⁰⁾中指出,这些成员所具有的该范畴的特征并不相同,有些成员的特征对该范畴而言更具有代表性⁽¹¹⁾。这样的成员就是该范畴的“原型”(prototype,或译为典型)。原型有时带有强烈的民族或地域特征。例如,水果这个范畴包括许多种类。从产地看,对中国的北方人而言,苹果可能最能代表水果,也就是可视为水果的典型;但是对南方人而言,橘子则可能是水果的典型,因为中国南方不产苹果。对新疆人而言,他们可能视葡萄为水果的典型。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市场上,柑橘类水果同苹果和葡萄一样丰富。这几年,洋水果大量上市,就很难说什么水果是原型了。

谈到橘子时,要顺便指出,在有些词典的有关词条中,柑、橘、橙的区分不是很严格的,即模糊的。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拙文《表示 orange(橙、柑)类的词的词源和地理分布》⁽¹²⁾。在此要补充两点:(1)在生活中(不是在植物学的分类中),一般人常用大小、皮的厚薄和汁的多寡来区分橙子和橘子;但是卢柑似乎介于二者之间,因为其皮比橘子厚,比橙子薄;其个儿比橘子大,比橙子小;其汁比橙子多,比橘子少。可能是因此,《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卢柑”(《现代汉语词典》未收此词)释为“福建漳州等地出产的柑橘”。(2)赵元任很早就注意到同上面讲的有关的问题。在《中国话的文法》⁽¹³⁾中他说道:“普通柑橘类水果至少有十种名称,在中国最普通的是‘橘子’。在美国说中国话的人,习惯上不止(只)管 tangerine(柑橘——伍注)叫‘橘子’,管 orange(《新英汉词典》译为‘橙子、柑子、橘子’——伍注)也叫‘橘子’,管 orange juice 叫‘橘子水’或‘橘子汁’,虽然他们都清楚地知道,orange 的正确植物学名称应该是‘橙子’(不过在美国说广州话的人

也说‘橙’跟‘橙汁’。这是因为广州出产橙子。事实上,北方人又管橙子叫‘广橘’。)”(14)。赵元任 1975 年在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学刊》第37-38合刊所载《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中再次说到这个问题。他说:“‘字’和 word 的关系就好比通常用‘橘子’对译英语的 orange。其实,橘子在构造上属红橘(tangerine),与甜橙(orange)是不同的植物。但是由于橘子是中国常见的柑橘类水果,就像甜橙在其他国家中最常见一样;于是,‘橘子’这一名称的作用就变成指‘最常见的柑橘类水果’了”(15)。如果这个问题可以被看作柑橘类水果的模糊性质和其中哪类柑橘可以被视为其原型的话,我们不妨说,赵元任已不自觉地觉察到后人称之为“原型理论”的现象,比 E. Rosch 等人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原型理论要早若干年(如以赵元任出版《中国话的文法》的 1968 年同 E. Rosch 等人 70 年代提出范畴论和原型理论相比的话),尽管赵元任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两个理论及其术语,也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论述。

在此还要指出,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会长姚德怀先生 1994 年在港刊《语文建设通讯》第 3 期发表了一篇很有意义的文章《橙、柑、橘、桔、枳》后,看到了上引拙文《表示 orange(橙、柑)类的词的词源和地理分布》,给我写了一信,现征得他的同意,将其内容发表于下。由此可见,他的见解同赵元任的可说是相映成趣:

1. 一般的英汉辞书,似有不可靠之处。英汉辞书的编纂者似无时间进行有关考证工作。

2. 在中文来说,书面称谓常有各地方言的干扰。以前的人似未充分体会到方言的重要性。

“橙”(orange)书面上早有。“橙”产广东等地(硬皮,以前广东“新会橙”甚出名,现在少见了。据说美国的 orange 原种即源自广东),粤语口语即说“橙”,orange juice 粤语是“橙汁”。

但是,上海一带(可能北京也是),口语中不说“橙”(似不顺口),多说“橘子”。因此 orange juice 便成为“橘子水”了。其实 orange juice 乃由硬皮的橙榨出来。用软皮的橘子(mandarin)来榨,不方便。因此,说“橘子水”是不对的。

我小时候(1948年前)在上海。抗战后上海有来自美国的 orange。上海人称之为“花旗蜜橘”,不称“橙”。我想“蜜橘”用来

指橙,可能是上海等地的人“发明”的。粤语似无“蜜橘”此词。但是,上海人及其它“外省人”到了香港,受广东人影响,现在也用普通话说“橙”(orange)和“橙汁”(orange juice)了。这便对了。

3. 广东口语基本上不用“橘”(可能不顺耳)。mandarin 粤语称“柑”,以前“潮州柑”著名,现在台湾的柑质量较好。

E. Rosch 认为,范畴是由原型和跟原型相似(其实“相似”也是一个模糊概念)的程度逐渐递减的成员组成。这种相似度分高、中、低三个级别。人们对范畴的理解是按照原型及与原型的距离来进行的,范畴中较典型的成员同范畴中心意义(core meaning)的距离比非典型成员同中心意义的距离近。例如,在鸟(bird)的范畴中,知更鸟(robin)和鹰(eagle)最为典型,鸡(chicken)、鸭(duck)、鹅(goose)次之,企鹅(penguin)再次之。鸟属脊椎动物。A. Wierzbicka⁽¹⁶⁾在 B. Aarts 等主编的《模糊语法读本》第 463 页上说,蝙蝠(bat)属哺乳动物,在操英语的人的直觉当中肯定完全不是鸟⁽¹⁷⁾。她在该书第 464 页说,澳大利亚的一种当地语言中根本没有表示“鸟”的词,与之对应的最接近“鸟”的词却包括蝙蝠、蚱蜢和蝗虫。她在该书第 468 页上还谈到同模糊理论和原型论有密切关系的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她说,“‘家族相似论’在发展(西方的)‘原型语义学’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但是“现在到了要重新审视‘家族相似学说’的时候了……看看它是否真地正确”。

说到原型,我们不禁想起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和外国有关音位的各个音素之间,一个语素的不同变体(语子)之间,一个词的不同语法形式(如俄语名词的各个格变形式之间),多义词的多个义项之间有没有一个典型的问题。为此我在《语言教学与研究》1979 年第 2 期发表了一篇长文《评高名凯〈语言论〉中的“位”“素”理论》,就此问题和其他问题同高名凯先生进行磋商。那时还没有出现今天才诞生的模糊理论和原型理论。但即便如此,对今天的原型理论也还有不少人提出很多不同的意见,主要是究竟将范畴中的哪个元素视为原型,并不存在客观的标准,原型理论能不能很好地用来界定词义等等也还都是问题。看来,这里要区别两种情况。以“人”为例,人包括男人、女人、成年人、婴幼儿、中国人、外国人等等,在这中间,各种人的地位是平等的,绝不能说哪种人是典型的人。但是从类人猿—猿人—智人的过渡中,却的确存在人与非人之间的模糊区域,因此也

存在原型的问题:哪个时期的物种更具有人的特征,因而可以视为人的原型。

我在研究模糊理论时发现四段很重要的话,未及写进上引拙著《模糊语言学》,现引在下面,作为对拙著的补充。

(1)“日本的模式识别和人工智能专家渡边慧的工作表明,为了了解人的决策过程,模糊概念是必不可少的。

“渡边慧认为:有一个概念,相应地就应有一个对象的集合。例如,有狗的概念,就有全部狗的集合。给这个集合下定义有两种方法:一是把狗的性质一个一个地列举出来:狗有四只脚,大约多重等等,即用集合的内涵给集合下定义。另外一种方法是把所有的狗都列举出来,即用外延给集合下定义。原则上说,这两种方法电子计算机都能做到。但是,渡边慧指出,母亲把狗的概念教给孩子却不采用经典数学上的上述两种方法。内涵和外延都没有给出,只是说这是狗,那不是狗,让孩子看几次以后,区别就清楚了。这样,母亲没有把全世界的狗都领给孩子看,也没有给孩子讲清狗的严格定义,而只靠极少数几个实例代表全体,就教会了孩子掌握狗的概念。这是一种不同于借助内涵和外延的第三种方法。渡边慧认为:‘这是人类思考事物的独特的特点。’

“现在,进一步考察上述问题:孩子经过这样的简单训练后,果真能完全准确地判断出狗与非狗吗?当然未必。就多数情况而言,孩子确实能够不困难地做出判断。但是,当他第一次到动物园看到狼,可能把它当成狗。多看几次,或者可以把二者区分开。但是,突然看到公安局警犬队的大狼狗,他又会犹豫了。因此,对孩子来讲,狗的概念实际上是模糊概念,狗的集合是模糊集。母亲教孩子确定狗的集合所采取的方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隶属度最高(等于1,就是‘狗’)和隶属度最低(等于0,‘不是狗’)这两种极端情况,而暂时略去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复杂情况。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就按隶属度的大小回答为‘不像狗’、‘也许是狗’、‘很像狗’、‘非常像狗’[即借助模糊限制词语(linguistic hedges),这正是庞建荣博士的专著所研究的内容之一——伍]等等。所以,首先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极端情况,选择若干

典型进行训练,然后逐步加深对模糊的中间情况的了解,是一种效率最高、运用最灵活的决策模式。可以设想,如果用借助于内涵或外延的方法来确定狗的集合,那将十分精确而不存在任何模糊。但与此同时,那也是笨得不可思议。过分的精确反而迂腐,适当的模糊反倒灵活,这恰是人脑比机器高明之处。

“这样,数学的研究对象从物理进入事理,发展为需要考虑人的主观因素,需要设法提高电子计算机的‘活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对充满了模糊现象的人的思维机制的研究。于是,模糊集的研究从个别领域、个别学者的个别成果发展为一种全局性的需要。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 L. A. Zadeh (1965) 关于模糊集理论的开创工作。”⁽¹⁸⁾

(2) L. A. Zadeh 指出:“在人类知识领域里,非模糊概念起主要作用的唯一部门只是古典数学。一方面,这使数学具有其他学科所无法与之比拟的一种美、力量和广泛性;另一方面,却也限制了它在模糊性起显著作用的领域里的应用——特别是人文系统,这里人类的判断、感觉和情绪起重要作用。”“如果深入研究人类的认识过程,我们将发现,人类能运用模糊概念,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不是负担。这一点,是理解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之间深奥区别的关键。”⁽¹⁹⁾

(3) J. von Neumann 在论述人的神经系统时曾指出:“这里存在着另外一种逻辑结构,它和我们在逻辑学、数学中通常使用的逻辑结构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逻辑结构,其标志是更小的逻辑深度和算术深度”,即“较低的算术准确度水平,……却得到较高的逻辑可靠度水平。就是说,算术上的恶化,换来了逻辑上的改进。”⁽²⁰⁾

(4) 刘应明和任平指出:“到目前为止,最先进的计算机也还存在一个根本缺陷,即不具备人脑所特有的模糊推理、模糊决策的能力,不能像人那样在模糊环境下处理用自然语言表达的知识,不能像人那样灵活地做近似推理,也不能用自然语言与人对话。计算机虽能准确地控制飞船登月,却难以识别人的音容笑貌。在某种意义上说,其‘智能’水平不及一个婴儿。事实上,把目前全世界所有的超大型计算机‘动员’起来,也解决不了诸如

婴儿识别母亲这样一些看起来十分简单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求计算机具备处理模糊信息的能力,从而要求人们对模糊概念、模糊推理应有深入的了解。”⁽²¹⁾

对模糊语言的研究除语义和认知的视角外,还有学者采用语用学的研究视角,如 E. F. Prince 等人⁽²²⁾、L. C. Burns⁽²³⁾、J. Channell⁽²⁴⁾、T. Endicott⁽²⁵⁾等。他们将模糊看作一种语用现象,L. C. Burns 就认为,判断一个论题是否模糊,取决于说话人的兴趣、目的和听众的期待,这也正是本书作者庞建荣博士所持的语用观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研究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模糊语言研究的“边界情形模糊”的词语,而是集中探讨了模糊语言的语用方面——模糊修辞,即在具体语境中为了达到特殊的修辞效果而有意采用模糊语言,拓宽了模糊语言的研究范围。该书将语用学、修辞学和模糊语言研究巧妙地结合起来,是跨学科研究的一次成功的尝试。该书主要讨论政治文本中的模糊修辞,因而大部分语例取自她写作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美国 2000 年的总统大选和 2003 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战争等。这些语例读来生动有趣,为该书增色不少。

序者简介

伍铁平(1928—),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中英友好奖学金第一届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委高校八五、九五计划语言学规划咨询组负责人,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语言学课题评审组召集人。

在 50 年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中,先后主编过 6 种学术刊物,发表了专著、译著和校著 11 种;主编《普通语言学概要》,专著有《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模糊语言学》、《语言和文化评论集》等。在国内外语言学刊物上发表论文、译文 600 余篇。

伍铁平教授是我国第一位从事模糊语言学、语言类型学、比较词源学和中西语言学说史比较研究及语言学学术批评的学者。曾 10 次出国讲学和参加学术会议。